

湖湘文化论坛

主编 庾建设



湖南大学出版社

湖湘文化论坛

主编 庾建设

副主编 何祖健 龙跃君 唐亚阳

顾问 成文山 陈谷嘉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湘文化论坛/庾建设主编.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2. 4

ISBN 7-81053-475-0

I. 湖... II. 庾... III. 文化事业—研究—湖南省—文集 IV. G127.6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568 号

湖湘文化论坛

Huxiang Wenhua Luntan

庾建设 主编

责任编辑

肖立生

封面设计

龚震西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码 410082

电话 0731-8821691 0731-8821593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装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32开 印张 12.25 字数 296千

版次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1053-475-0/C·40

定价 18.00 元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陈谷嘉

当今湖南社会上层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在省委的重要讲话中，几乎都要提到湖湘文化，好像不提就不够品位。”的确，发掘和利用好湖湘文化这一重要历史资源，是摆在湖南人民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众所周知，社会的前进和发展，都是要以历史为起点，“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因为我们有历史”。离开了历史，就没有发展。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正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曾被历史尘封的湖湘文化再次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成为了学者们讨论的重要的热点问题。讨论伊始，是否能以湖湘文化涵盖和概括湖南文化发展的历史及其基本精神，有不少学者颇感犹疑，认为湖南地处楚国，长期受楚文化的影响和支配，似乎提湘楚文化为宜，或者说湖南文化表示出荆楚文化的特征。围绕湖南古代文化发展的特征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岳麓书院由于修复的需要及挖掘其文化价值的要求，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便开始对湖湘文化的研究，重点地展开了在理学中独树一帜且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的研究，相继出版了《岳麓书院名人传》、《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和《湖湘学派源流》等著作，试图以湖湘文化来概括宋代以后湖南文化千年发展历史特征，并且提出湖湘文化在时间上限定在宋代及其以后近千年的

文化发展，而在空间上则严格限定三湘领域内，确切地说，湖湘文化是宋代湖湘学派兴起后所出现的颇具湖南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换言之，湖湘文化虽与楚文化有一定联系，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楚文化了，它是一种有别于楚文化而具湖南区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书院的研究虽是极其初步的，但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和关注，有的学者在湖湘文化讨论会上推介说：“关于湖湘文化的问题，岳麓书院已不是能不能提湖湘文化的问题，而是进入到了讨论和揭示湖湘文化内涵和基本精神的阶段，并已出版了书。”学者们的推介，无疑是对我们一种鼓舞和鞭策。经过学者们的讨论，可以说大家认定了湖湘文化这个概念，认定湖湘文化是祖国古代斑斓多姿地域性文化中的颇具典型性的区域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个性。

为什么说湖湘文化是宋代湖湘学派形成后所出现的具有湖南特色的一种文化形态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湖南在宋代形成了一个具有独自理论系统和概念系统的哲学流派即湖湘学派，湖湘学派是理学中一个著名学派，它所建构的哲学体系既不同于程朱的理本论，也不同于陆王的心本论，而是区别这二者的性本论。这种哲学体系的建构，其理论意义十分巨大。它标志着自成体系的湖南地域文化即湖湘文化将要形成。众所周知，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哲学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基础，检视历史，任何一种新文化的出现都是以哲学的变革为先导的，犹之乎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和指导，才能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样，也只有在理学中颇具特色的湖湘学派哲学体系的形成，才可能产生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湖湘文化。湖湘学派哲学体系的形成，不仅提出了一个观察世界和探究人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也为湖湘文化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赋予了人们创造文化的灵魂和智慧。反过来说，在宋代以前，由于湖南尚未出现相对独立的哲学流派，因而它不能形成独自的文化体系，换言

之，它只能属于楚文化的范畴。这是人们对湖湘文化这一概念的基本认识。

其实，学者们在讨论中所勾勒和揭示的湖湘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精神，从本质上说，这都只不过是湖湘学派重视主体性并要求主体性与客体性相融合精神的体现，或者说展开，湖南人崇尚务实和开放及包容的胸怀乃至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等等，追本溯源，无一不是发源于上述哲学的指导，无一不是湖湘哲学内化为人们主体意识的产物。一句话，要真正把握和认识湖湘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精神，还必须从对其哲学的剖析入手，否则，即使罗列多少条基本精神，也只是对湖湘文化的表层上的一种描述而已。

诚如上述，岳麓书院曾是湖湘学派的活动基地，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即是书院的主教，岳麓书院对千年以来湖湘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从宋代历元、明、清，岳麓书院始终是湖湘文化研发和传播的中心。因此，继承和弘扬湖湘文化精神，是与岳麓书院一脉相承的湖南大学责无旁贷的任务，无论对发展湖南大学学术或是培养人才，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具体言之，湖湘文化既是千年学府的历史传统，也是把湖南大学推向世界并办成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提供了其他高校所不具备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自不待言，湖湘文化无疑也是对学生开展文化素质教育难得的好教材。基于以上考虑，所以学校在面向全校大学生的人文讲坛中极有远见地开设了“湖湘文化论坛”系列讲座，受到了广大学生的普遍欢迎。为了让更多学生享受和品味这些知识大餐的精神营养，我们将一部分优秀文稿收集在本书中。所谓论坛，既可以是面对面的宣讲，也可以以论文的形式发表，本书所结集的文章就包括了这两部分。不管是前者或是后者，都反映出了近几年湖湘文化研究的新成果，都是我们立足当代继承优良传统的极好的教材。

湖湘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本文集所收集仅限于思想文化。考虑到既是专指精神的狭义的湖湘文化，所涵盖的内容也极为广泛，也考虑到湖湘文化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所以本文集作了三个部分的内容安排，第一部分是从思想文化上阐述湖湘文化，即思想文化篇；第二部分是从文学艺术上阐述湖湘文化特色，即文学艺术篇；第三部分是湖湘学人论文化。表面上看，这第三部分似乎于主题有碍，实际上这恰是湖南学人的一大特色，他们固然关注自己区域文化本身的建设，同时也关注整个中华文化的建设，始终把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本书的作者大部分是湖南的学者，也有少数外地学者的参与，可以说本文集无论从内容上和著述的作者来看，都已把湖湘文化扩大到了全国，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相信，湖湘文化在各方面的推动下，将会出现一个人们久盼的繁荣局面。

人文素质教育将是高校的一项长期的任务，开设的论坛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内容上虽然要不断地调整，但它作为人文素质的重要形式必将长期存在。毫无疑问，论坛成果结集的出版必将继续。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随着人文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必将有更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必将为广大青年学生提供越来越多的精神食粮。

目 次

前 言 陈谷嘉

诗教与文化 杨叔子 / 1

中国先秦哲学中的“天道”与“人道”问题 张岂之 / 10

思想文化篇

湖湘文化的优秀精神传统 刘克利 / 22

湖湘文化的开放性及其现实意义 王耀中 李金龙 / 29

湖湘文化三谈 朱汉民 / 41

湖湘文化溯源——湖南古代史发展大观 伍新福 / 56

近代湖湘佛文化管窥 徐苏铭 / 71

近代湖南的士风民气 刘决泱 / 84

抢救民间文化遗产 保护湖湘人文生态 颜新元 / 91

湖南消费文化之透视 吴孝政 / 101

岳麓书院文化对现代管理教育的助与滞 陈 收 / 108

宋代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形成 邓洪波 / 118

湖湘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和近代“商战十学战”

 思潮举隅 许 康 / 128

 湖湘文化的精神性格探析 龙佳解 / 139

 湖湘文化与当代湖南经济发展 罗能生 / 147

 屈原自杀的文化心理根源 吴龙辉 / 156

 忧国忧民的长沙王太傅贾谊 王兴国 / 164

 中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王夫之 章启辉 / 179

 王船山评韩愈之“道” 熊志庭 / 194

魏源思想管窥	廖进中 / 203
左宗棠与湖湘文化	冷鹏飞 / 210
近代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与湖湘文化	胡 遂 / 220
谭嗣同的文化会通观及其启示	肖永明 / 229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沧 南 / 235
湖湘文化中的实学思潮与毛泽东实践哲学	张忠良 / 245

文学艺术篇

漫谈湖南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	黎跃进 / 255
屈原与湖湘文化	雷庆翼 / 265
贾谊其人与他的辞赋创作	郭建勋 / 274
冯子振与湖湘文化	王 毅 / 283
元代湖南文坛的“一代宗师” ——欧阳玄及其诗文成就	陈书良 / 293
渗透与互济:曾国藩诗学观、古文观的形成、发展与 变化	王澧华 / 299
魏源诗论述评	刘社瑞 / 308
美在超越 ——评何纪光新型高腔唱法的艺术实践	尹晓星 / 316

湖湘学人论文化

养习于童蒙 成人于大学

——在校学生品德教育衔接构想	曾创新 / 325
道家的心理健康智慧	吕锡琛 / 338
如何更好地与日本人交流	张佩霞 / 347
中国美术的现状与思考	陈飞虎 / 361
人生是一个影子所做的梦	罗健凡 / 374

诗教与文化

——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千家万户

杨叔子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这首儿童歌曲，把小燕子、春天与祖国的大好建设紧紧连在一起。这是儿童歌曲，它的歌词也是现代的儿童诗篇。湖南澧县方石坪镇中心小学学生孙红也写了首诗：“春到燕归来，鲜花遍地开。我在花丛里，温馨入胸怀。”是的，现在果真是我国的大好春天，“江山如此多娇”！

正当我国朝气蓬勃，跨入新千年的時候，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2月提出了“三个代表”这一重要思想，接着他在2001年1月又提出了“以德治国”这一重要论述，告诫我们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的，“以德治国”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的进一步发挥，突出了我国“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这一优秀传统与当代形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紧密结合，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

在稍早一些时期，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的一次关于“三讲”的讲话中，就引用了《论语·为政》中孔子的话：“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显然，江泽民同志此时就已指出了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以德治国”的本质就是“以德育人”，就是“明明德”，就是“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就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德的教育，人文文化的教育，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是教育人之为人的最基础的教育。这也正是先进文化作用之所在。岳麓书院的优秀传统：“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根本就在“育人”而“成人”。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物，在于人是“活”的，物是“死”的。活的教育，是“育人”；死的才琢制，是“制品”。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禽兽，因为人有复杂的感情、思维、精神境界，有个性。基因只提供了感情、思维、精神境界与个性形成的物质基础，而后天因素、环境、教育却决定着形成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精神境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人，得按着人的标准来教育，而非按着“宠物”的标准来豢养；否则，可以豢养出比禽兽还不如的披着人皮的“人”，《诗经·相鼠》骂得多么痛快：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后天因素中，教育尤其重要，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这三者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对于不同的人由于所处环境的差异以及教育如何开展，这三者的作用大小可各不相同；但不论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以文化，特别是以人文文化教化着、养成着、熏陶着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学即教育。我国“书院文化”的精神就是“育人”。湖南澧县历史上有个“澧阳书院”，为纪念范仲淹而建立的，原因不在于他为湖南写了一篇千古不朽的《岳阳楼记》，而在于他在此文中提出了永放光芒的“为人之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光辉思想。今天澧县青少年诗社蓬勃发展，中华诗词得以广泛传播，《湘澧新声》连续出版，不能不与此优秀传统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对文艺工作者，其实也是对教育工作者、对各个领域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人文教育在“育人”中占有基础地位，而诗教对人的熏陶、感悟、启迪、充实、升华

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个言，不仅是指“言”本身，而且展现着人的精神风貌，试看，《礼记·孔子闲居》中明确指出：“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显然，诗表现了志，“诗咏志”；而且伴有了礼、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难怪乎将《诗》置于六经之首。我们要“以德育人”，也必须有“以诗育人”，有诗教，这是“以德治国”、“以德育人”题中应有之义。

诗可以说，是最古老的、最具活力的、最适应时代的文艺作品。南北朝刘勰指出：“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及至有了文字，就有了《书经·尧典》的精彩记述：“诗言志，歌永言。”纵观中华诗词的发展，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近代昆剧、汉剧、京剧等剧种以及歌曲，莫不强有力地显示：诗既与歌或以唱以吟，或以载歌载舞而紧密相联系，又靠其本身特性或琅琅上口之声，或赏心悦目之形而独立发展，从而流传民间，教化民生。一首流传民间经久不衰的好歌，其歌词就是一首好诗，一首好诗脍炙人口，流芳千古，往往又会谱成一首好歌；这体现着一种感情、一种境界、一种追求、一种精神，影响深远。

诗，特别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诗词，形式上，文字精练，文体奇美，声韵协调；内涵上，感情丰富，意境深邃，境界高超；历史上，源远流长，博大精美。影响之广之深之远，实难尽言。概而言之，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在当前，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五种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五种精神就是优秀传统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民族精神。试看，从《诗经》中妇女所高唱出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到毛泽东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

攀”；从刘禹锡的“劝君莫奏前朝曲，且听翻新杨柳枝”，到毛泽东的“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从辛弃疾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到毛泽东的“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从民谚的“只要心意坚，铁石磨成针”，到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龚自珍的“化作春泥更护花”与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到毛泽东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与“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化作倾盆雨”……这五种民族精神正是我国优秀传统的时代体现，正指明着我们的人文文化教育、诗教所应塑造的现代的民族精神。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的“双百”方针，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方针。主旋律是什么？是现代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坚持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百家、百花的多样化中体现这一主旋律，用这一主旋律来赋予多样化的百家百花以灵魂。中华诗词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始终张扬着时代主旋律，高奏时代最强音，今天更是如此。刘瑞清写的七律《开元颂》多么好：“饶它国际风波涌，未改心仪马克思。”李正常写的七律《闻郎平毅然回国任职作》写得多么好：“太平洋水深千尺，不及阿郎报国心。”

孔子对诗的经典论述，其精神一点也不过时，而且熠熠生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今天，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与生活。“科教兴国”，这里既应包含崇尚科学，又应包含弘扬人文，两者不可偏废，两者紧密相连，无法分割。没有以科学作为基础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而没有以人文作为精神的科学也是残缺的科学。毫无疑问，我们应向千家万户大力普及科技教育，也应向万户千家积极开展人文教育、诗教，即让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对燕子，双双飞入寻常百姓家。

姓家。要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科学方法。鸟兽草木以及客观现实，代表科学知识；知识正确用于实际，待人处事，如“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代表科学方法。兴，如果是指开放的想象能力、形象思维，那么这正是人文文化之所长；观，如果指观察事物的推理能力、严密的逻辑思维，求真，那么这正是科学文化之所长；群，能关心群众、团结群众、凝聚力量，走群众路线，这也既包含了求善，也包含了求真；怨，能正确宣泄感情，恰当讽刺人事，适宜处理不满，这也是求善。兴、观、群、怨，显然包含了科学的求真精神与人文的求善的精神，包含了科学的严密的逻辑思维与人文的开放的形象思维。科学与人文的互异互动，彼此相融，就能形成正确而完备的精神与思维。由此可见，诗教非但起着人文教育作用，而且实际上有利于科技的普及与提高。古今中外，不乏此例。2001年2月1日《科技日报》头版刊登的蒲慕明先生的谈话，强调人文对科学家的作用，即一明证、近证，可闻可见。蒲是美籍华人，生于台湾，学于台湾清华大学理工科，后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现应聘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位“外国”所长。他在大学时代就是学校从事文史活动社团“观澜社”的积极分子，喜爱诗词。人文文化、中华诗词对他的影响可谓深矣！蒲慕明先生的见解与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先生的见解不谋而合，归结起来，人文教育的主要作用有二：升华精神境界，提高思维品质。我一再强调，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何况，在“科教兴国”的科普工作中，还可在一些情况下采用合适的诗的形式普及科技。仔细考察一下，采用诗的形式进行幼儿教育，我国一直有着优秀传统。这里不谈蒙学中的三言诗、四言诗、韵文，就例如，破除风水迷信的有首七绝：“风水先生言总空，指南指北指西东；若还果有王侯地，何不选来葬乃翁？！”除了“乃翁”有点“文绉绉”的话，

其余十分明了易解。“文以载道”，极易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更可用以载科技之道了，载科学知识、方法、思想、精神！

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人们交往极大地增加了，一切文艺作品也应发展，而且也在发展，中华诗词也毫不例外。“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何况，源于生活，源于实践的中华诗词，如同其他一切文化一样，也需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诗源于民间歌谣，后经高人雅士文人墨客加工、研究、创制、提高，有的诗又不断回复到民间，广为传播，不断充实；同时，上下交流，彼此影响，共同发展。“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显然，在今天，中华诗词的发展第一个要求就是应有时代特点，充分反映时代，言时代之“志”，表时代之情。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变化着的时代，高科技大展雄风的时代，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时代，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我国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中华民族振兴的时代。魏仲文的《瞻天安门》写得好：“毛公一语惊天下，中国人民站起来。”新时代的新内容、新事物、新概念、新感触太多了，何处不文章？！我认为，反映时代，就是坚持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是坚持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要坚持源于生活，源于实践，高于生活，高于实践的创作原则。

中华诗词的发展第二个要求是要善于继承传统，要继承与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我十分赞成这一讲法：要坚持三面向，就要背靠五千年。其实，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清楚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华诗词的形成正是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重要结晶，从汉字、用词、造句、成文，无一不与民族特性和传统相连。毫无疑问，中华诗词要发展，但决不可能抛弃字、词、句、文各方面经历长期砥磨而形成的表达形式及其

拥有的相应内涵。没有过去，就没现在，没有继承，哪能有创新？！“散文拆开打标点”的所谓“新诗”，照搬“西化”模式的所谓的“新诗”，历史已证明了中国人民不会接受，而且还会继续证明不会接受，而那些吸取了中华诗词特点的新诗，势必继续茁壮成长。读一读闻一多先生的《红烛》名诗吧，其中写着：“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不是现代《离骚》风格的诗又是什么？！

中华诗词的发展第三个要求是吸取科学营养。要充分吸取现代科学知识、方法、思维，使文艺作品创造的基础即实践与生活以及其内在特性、规律更为明确、完备、坚实，使中华诗词固有的开放的形象思维同科学的严密的逻辑思维更加合适地结合，形象思维更加展翅高飞。如中南大学教授陈赫写的七绝《咏粉笔·赠教师》：“模范型成正直身，白头笑对黑头吟；一生磨炼灰飞尽，擦去遗痕让后人。”此诗处处人文，又处处科学。因此应邀，我和了陈赫一首，“已身不为为他身，写史忘身共啸吟；身化灰飞身价几？身身不已有来人！”比之原诗，自感逊色。著名的水轮机专家、华中科技大学程良骏老先生长期从事水轮机科技与三峡水电工程研究，在他的诗中，不少诗句是写人情、写景色、又是写物理、写科技，例如，《梦隐》一诗，最具典型，诗的《小序》写道：“接三峡设字〔1995〕第242号文，得知我最先提出的每台机组增容80万千瓦以上，以求高水头下稳定的建议已采纳。”他的诗便表达了这一创见及对此的炽热情怀，其诗曰：“美人芳草惹多思，巫峡云开日出时。解‘辫’增容卿梦稳，‘整冠对镜’载神驰。挟沙速卷涡留颊，戴雪迟归香满衣。一笑来依神女座，挥毫更细绘‘双眉’。”从事水轮机的人一看即知，这首诗句句都在讲三峡工程，讲三峡大型水轮机组。它最后一句的“双眉”，绝不是真在说巫山神女，而是指水轮机转轮叶片在上冠与

下环处的翼型。文艺中的夸张、想象绝不是反科学的，而是将所描叙事物的“特征不变量”地强调与突出，是将事物的“神似”写得更为动人，是立足于客观的一种强化、放大，一种希望、追求，是给予人们一种更美妙的享受，一种更深刻的启迪，一种更高远的飞升，并使之为现实的更加美好而努力。

中华诗词的发展第四个要求是坚定走向大众。要“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努力传播于民间，就是要努力普及，就是要大众化。这不仅使诗有了提高的基础与源头，而且也使诗这一文艺作品可以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战斗任务，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凝聚力量，促进伟大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振兴。大众化，大众口语恰当入诗，不仅有利于诗的传播，而且有利于诗更具有生命力，从《诗经》的“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到曹植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到孟浩然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到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到苏轼的“但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直到毛泽东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莫不明白如话，毫无隔世隔代之感！从《诗经》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到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于谦的“粉骨碎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到郑燮的“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一直到毛泽东的“要扫尽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莫不脍炙人口，泽被千秋！时代变了，用字用词用句乃至诗的体裁，有一贯稳定的部分，又有依时改变的部分。稳定的应该继承：如好的口语、好的文言、好的成语、好的用语；改变了的应该抛弃，而代之以新的字、词、句。韩盛理的《农民科校》的“阿娇卖菜归来晚，一嘴馒头进课堂”，徐中秋的《山村女教师》的“‘拜拜’一声人去后，凝眸犹自送顽童”，写得多么有生气，有时代感！馒头、课堂、“拜拜”，用得何尝不美？！毛泽东同志也是一位难与伦比的